

先秦儒学要略

戴永明 著



2.05

每交通大学出版社



259

大学文化素质教育丛书

先秦儒学要略

戴永明 著



A1042114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本书针对理工科大学生的知识结构和阅读特点,结合他们实际状况和需要,分哲学、伦理、经济、文艺和教育五个方面系统地介绍了先秦儒家文化的基本思想,既突出了儒家文化的核心内容,又照顾了当代读者的阅读兴趣。全书共分五章十四节三十五目九十多条,结构新颖、层次细腻,基本顾及了先秦儒家在这五个领域中的主要观点。

书中大量引用儒家名作、名篇、名句,一方面能开拓青年读者的视野,另一方面也能帮助读者比较客观、系统地了解儒家思想,提高对民族文化的兴趣,为正确评价儒家文化的成就打下基础,在协调学科性、知识性与可读性方面做了颇为有益的尝试。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先秦儒学要略/戴永明著.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2

(大学文化素质教育丛书)

ISBN 7-313-03130-0

I. 先… II. 戴… III. 儒家—哲学思想—简介
IV. B222.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56846 号

先秦儒学要略

戴永明 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番禺路 877 号 邮政编码 200030)

电话:64071208 出版人:张天蔚

上海交通大学印刷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90mm×1240mm 1/32 印张:6.125 字数:174 千字

2002 年 9 月第 1 版 200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50

ISBN 7-313-03130-0/B·027 定价:11.00 元

目 录

第一章 先秦儒家哲学思想	1
第一节 仁论	1
一、仁也者，人也	1
二、为仁由己	7
三、以德行仁者王	12
第二节 礼论	24
一、不知礼，无以立	24
二、礼之用，和为贵	32
三、克己复礼为仁	39
第三节 道论	42
一、一阴一阳之谓道	42
二、中庸之道	49
第二章 先秦儒家伦理思想	56
第一节 道德规范论	56
一、仁者爱人	56
二、忠恕之道	63
三、孝悌为本	67
第二节 修养方法说	74
一、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	74
二、内省吾身，改之为贵	80
第三章 先秦儒家经济思想	84
第一节 财富与财政观	84

一、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	84
二、足食，足兵，足信	90
三、薄赋敛，什一税	93
第二节 生产、分配与消费.....	97
一、四时行焉，百物生焉	97
二、不患寡而患不均	100
三、俭不违仪，用不伤义	103
第三节 大同小康说.....	107
一、大道之行，天下为公	107
二、大道既隐，天下为家	110
第四章 先秦儒家文艺思想.....	115
第一节 兴于诗 立于礼 成于乐 游于艺.....	115
一、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115
二、发乎情止乎礼仪	118
第二节 诗可以兴、观、群、怨	123
一、小子何莫学夫《诗》.....	123
二、“兴”、“观”、“群”、“怨”	127
第三节 尽美尽善 立象尽意	135
一、尽美尽善 乐之至于斯	135
二、圣人立象以尽意	139
第五章 先秦儒家教育思想.....	146
第一节 教育思想.....	146
一、有教无类	146
二、庶之、富之、教之	150
第二节 教育目的.....	156
一、君子忧道不忧贫	156
二、学而优则仕	161
第三节 教学方法.....	168

一、因材施教	168
二、以身作则	171
三、诲人不倦	176
四、不悱不启	178
后记	185

第一章 先秦儒家哲学思想

第一节 仁论

仁是孔子创立的儒家文化的核心。《吕氏春秋》在归纳先秦诸子的特点时,做过这样的概括:“老耽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廉,关尹贵清,子列子贵虚,陈骈贵齐,阳生贵己,孙膑贵势,王廖贵先,儿良贵后。”(《吕氏春秋·不二》)由此看来,早在先秦时期,人们就把“仁”看作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内容。仁既是孔子最高的政治原则,也是其最高的道德准则。

一、仁也者,人也

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人生理想的是孔子。孔子的人生理想和“仁”密切相关。“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是儒家全部学说中最主要的部分。值得注意的是,《论语·子罕》第一章明确说孔子生前很少谈论三件事:“利”、“命”和“仁”(“子罕言利与命与仁”)。据当代学者杨伯峻先生《〈论语〉译注·〈论语〉词典》统计,在《论语》中,“利”字出现了10次,“命”字出现了21次,“仁”字出现了109次。可见,尽管孔子谈论“仁”的话不多,但由于他有关“仁”的论述十分重要,孔子的弟子对孔子有关仁的思想是极为重视的。

仁也者,人也

什么是“仁”?许慎的《说文解字》说:“仁,亲也,从人,从二。”从字的结构上看,仁就是两个人在一起。两个人在一起便发生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更多的人在一起,便组成了群体与社会。有了群体与社会,就有了调整、处理人际关系的要求。据有关学者考证,早在孔子以前一百多年,就已经有关于“仁”的言论了,如“仁不恶君”,“仁人不觉”,“亲

爱之谓仁”等等。但是，作为系统的思想体系，“仁”学则是孔子创建的。

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

儒家有关仁的思想内容非常广泛，境界也很高，但是，这种思想是紧紧围绕着人展开的，其理论也简易切近。在孔子看来，仁是人的根本，自然也是礼和乐的根本。人类社会如果不倡导“仁”，那么，作为人类文化的“礼”和“乐”也就失去了价值。孟子也说：“仁也者，人也。”（《孟子·尽心下》）一个人只有具备了“仁”的精神，才能算得上是“人”，而“仁”的精神也只有在人类的社会关系中才能体现出来。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知，子曰：“知人。”

樊迟未达。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

樊迟退，见子夏曰：“乡也吾见于夫子而问知。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何谓也？”

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论语·颜渊》）

孔子的学生经常向他请教什么是“仁”，《论语》中多次记载了他们向老师“问仁”及孔子根据不同的学生所做出的不同回答。在回答樊迟“问仁”时，孔子紧紧围绕现实的“人”来阐述仁的含义。“仁”就是爱护他人，“知”就是了解他人。这样简易切近的解说樊迟还是不能理解，孔子就进一步说：“举用正直的人来代替不正直的人，能使不正直的人变得正直。”从治理国家的角度来看，“举直而错诸枉”是以实际行动来推行仁道。要做到这一点，必须首先能爱护、了解他人。这既是个人修养的问题，又是为政的基础。和樊迟不同，子夏立即领悟了老师有关“爱人”、“知人”话语中包含的丰富含义。他也是从人的现实生活中理解仁的意义：舜有了天下，在众人中挑选了皋陶，于是，不仁的人就离去了；

汤有了天下，在众人中举用了伊尹，不仁的人就离去了。皋陶是舜的臣子，当过管理刑法的官，古人认为他是执法公平的典范。伊尹是商初的大臣，曾辅佐成汤灭夏和巩固商初的统治，是古代有名的贤臣。“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也能使“不仁者远矣”。仁不离人，仁就体现在“举直错诸枉”这种活生生的人际关系之中。

巧言令色，鲜矣仁

孔子认为，“仁”是人的最高道德品质，具有这个道德品质的人称为“仁人”。一个人必须有真情实感，“仁”才会有基础。

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学而》）

花言巧语、仪容伪善的人几乎不具备仁德，这不仅是孔子人生阅历的经验之谈，也是他衡量一个人是否具有仁德精神的重要标准之一。“巧言令色，鲜矣仁！”这句话在《论语》中出现了两次，此外，《论语》还记载了不少孔子类似的语录，足见孔子对“巧言令色”的憎恶：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论语·公冶长》）

仁虽然是儒家标榜的最高道德境界，但其基础则是建筑在人的日常行为之上的。孔子认为，花言巧语，伪善的容貌，十足的谦恭，这种态度是可耻的。内心藏着怨恨，表面上却同他要好，这种行为也是可耻的。“巧言、令色、足恭”、“匿怨而友其人”都是虚伪造作的，而虚伪的人不能成为仁人，因为他们已经失去了“仁”的品质基础，失去了“为仁”所必需的素质。

子曰：“孰谓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诸其邻而予之。”
（《论语·公冶长》）

微生高是鲁国人，醯是醋。别人向微生高要点醋，他自己没有，就从邻

居那儿要了点来给别人。有人说这是微生高正直品行的体现,孔子却并不赞同微生高的行为。孔子认为正直首先应该从实事求是做起。微生高没有醋,他可以把真实的情况告诉别人,是没有就说没有,这才是“直”。不告诉别人真实情况,而到邻居家里转借,好像自己家中本来就有醋的。微生高以为自己这种行为似乎是“直”,但在孔子看来这并不是“直”。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论语·子路》)

孔子就是这样看待正直品德的重要意义的:正直是人的生存基础,不正直的人也可以生存,但那是他侥幸地避免于祸害。尽管正直的人在现实生活中会遭受各种各样的挫折和磨难,尽管有人会根据其人生阅历和理论得出和孔子不同甚至是相反结论,但孔子始终强调高尚品德的价值。

子曰:“刚、毅、木、讷近仁。”(《论语·子路》)

一方面是巧言令色“鲜仁”,另一方面是刚、毅、木、讷“近仁”,对比非常鲜明:前者为人处世不用真情实意,后者凭着自己的真性情老老实实做人做事;前者是很少有人能成“仁”,后者虽然还不是“仁”,可是却已经接近于“仁”了。

子张问:“士何如斯可谓之达矣?”

子曰:“何哉,尔所谓达者?”

子张对曰:“在邦必闻,在家必闻。”

子曰:“是闻也,非达也。夫达也者,质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在邦必达,在家必达。夫闻也者,色取仁而行违,居之不疑。在邦必闻,在家必闻。”(《论语·颜渊》)

子张以为一个人能够做到在国中必定闻名、在家族中必定闻名就可以

称作通达了，孔子不同意学生的这种看法，他把通达和闻名做了区别：子张说的通达只是闻名，不是通达。所谓通达，是秉性正直而喜好义理，善于分析别人的言谈，观察别人的神态，思虑自己不如他人之处。所谓闻名，则是表面上追逐仁义而行动上却违背它，以此自居毫不疑惑。虽然通达、闻名都能做到“在邦必闻，在家必闻”，但是，两者在“仁”这个本质上还是截然不同的，注重自身的修养，自觉追求仁的精神，这是通达之人所为，是“近仁”的途径；表面追逐仁德，内心对仁德却没有一丝一毫的欢喜之情，这是闻名之人所为，是“鲜仁”的表现。

苟志于仁矣，无恶也

把“仁”作为最高的道德规范，阐明“仁”的基本内容，强调“仁”在人的行为中的重要意义，是孔子的突出贡献。孔子依据人性和人类社会实际状况倡导仁道，在他看来，“仁”既不是脱离社会、违背人性的远人之道，又不是可有可无、无关根本的枝节小道。

子曰：“苟志于仁矣，无恶也。”（《论语·里仁》）

树立仁的观念是一个人完善道德的关键，因为，一个人只要有志于仁，就不会有恶行。举例来说，富有和显贵都是人们所向往的，但是，如果通过不正当途径获得富有和显贵，这种富有和显贵就不应该享有；同样，贫困和微贱都是人们所嫌恶的，但是，不能通过不正当的途径去达到摆脱贫困和微贱的目的，而衡量途径正当与否的标准就是仁：

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
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论语·里仁》）

君子抛弃了仁，就等于抛弃了安身立命的根本，所以，君子任何时候都不违背仁，匆忙仓促之时如此，颠沛流离之时也必定如此。

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论语·卫灵公》）

遭遇穷困，这是君子和小人相同之处；面对穷困，君子能够安守穷困，不改变信仰，小人却会胡作非为，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这是君子和小人不同之处，因为君子始终重视节气，小人则没有操守。真正的君子，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违背仁的精神。

孔子厄于陈蔡，从者七日不食。子贡以所齎货，窃犯围而出，告籴于野人，得米一石焉。颜回、仲由炊于坏屋之下。有埃墨堕饭中，颜回取而食之。子贡自井望见之，不说，以为窃食也。入问孔子曰：“仁人廉士穷改节乎？”孔子曰：“改节即何取于仁廉哉！”子贡曰：“若回也，其不改节乎？”子曰：“然。”子贡以所饭告孔子。子曰：“吾信回之为仁久矣，虽女有云，弗以疑也。其或者必有故乎？女止，吾将问之。”召颜回，曰：“畴昔予梦见先人，岂或启佑我哉。子炊而进饭，吾将进焉。”对曰：“向有埃墨堕饭中，欲置之则不洁，弃之则可惜。回即食之，不可祭也。”孔子曰：“然乎？吾亦食之。”颜回出，孔子谓二三子曰：“吾之信回非待今日也。”二三子由此乃服之。（《孔子家语·在厄第二十》）

孔子和学生在陈蔡遭遇磨难，“从者七日不食”。子贡设法搞来了粮食，颜回在做饭时，把掉入饭中的脏物取了出来，并把被弄脏的饭吃掉了。子贡远远望见颜回的行为，以为他偷食米饭。孔门弟子中杰出人物比比皆是，孔子始终最赞赏颜回。很多人不理解孔子为什么总是称赞这样一个看起来在现实生活中并不“成功”的人。孔子最知道颜回达到的境界，也只有孔子最了解颜回的价值。“吾之信回非待今日也。”事实证明，颜回是值得老师信赖的。

二、为仁由己

既然仁是最高的道德规范,那么,怎样去追求和实现这个目标呢?孔子不但确定“仁”为最高道德规范,而且还确定了实现“仁”的方式。他认为,实现仁的根本动力来自于人自身,能不能实践仁德决定于每个人自己的态度而不是仰仗外力的促成。

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

以当代的语言讲,道德和法律都是维护人类社会秩序、调节人与人关系的手段和工具,而道德和法律的作用、方式是不同的。道德是依靠人内心的自觉性维护人际关系,而法律维系社会秩序依靠的则是外界的强制手段。孔子提出的“为仁由己”观点,揭示了道德观念作用于社会的方式,强调了实现仁德的特点:一个人能否履行“仁德”完全取决于自己,而不取决于他人。因此,一个人如果缺乏实践仁德的力量和行动,不应当把责任推向外,抱怨他人和外界阻碍了自己实现仁德,而应当反省自己:究竟有没有愿意行仁的愿望。

子曰:“我未见好仁者、恶不仁者。好仁者,无以尚之;恶不仁者,其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盖有之矣,我未之见也。”(《论语·里仁》)

孔子说他没有见过因为力量不够而无法行仁的人。“盖有之矣,我未之见也。”这样的人大概是有的,但我没有见过。显然孔子认为,一个人能否实行“仁德”,不是能不能的问题,而是愿意不愿意的问题。

冉求曰:“非不说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

道而废，今女画。”（《论语·雍也》）

这里讲的还是力量和愿望的问题。冉求强调的是“力”，是我们今天讲的客观：我不是不喜欢老师的道，而是能力不足。孔子强调的是“愿”，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主观：朝着目标前进，真是能力不足，可能半途而废，但是，连向目标迈出第一步都不肯，就绝不是能不能的问题，而是愿意不愿意的问题了。

我欲仁，斯仁至矣

尽管仁是儒家最高的德行范畴，其要求很高，但孔子认为仁并不是高不可攀的，只要去追求、去实践，一个人是可以具备仁德精神的。

子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

这里强调的仍然是人的内心对仁德向往的重要性。仁德遥远吗？不遥远！只要一个人真心希望去实践“仁”，“仁德”就会在他身上体现出来。可见，人人有实现仁德的基础，人人有选择践行仁德的自由。后来孟子更是直接提出“仁义礼智，我固有之”的观点，把“仁”看作是人与生俱来的一种“性”：

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或相倍蓰而无算者，不能尽其才者也。《诗》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曰：“为此诗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则；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孟子·告子上》）

恻隐之心就是仁，羞恶之心就是义，恭敬之心就是礼，是非之心就是智。

仁义礼智不是外界给予人的，而是人原本就有的。对每个人来说，区别不在于有没有这些“固有之心”，而在于对待这些“固有之心”的态度：“求则得之，舍则失之。”人与人之间相差一倍、五倍以至无数倍的原因，就是因为人们在对待、发挥他们的天性时有天壤之别。仁义德性，“求则得之”可以成仁人，“舍则失之”则会成恶人。

万章曰：“父母使舜完廪，捐阶，瞽瞍焚廪；使浚井，出，从而掩之。象曰：‘谋盖都君咸我绩，牛羊父母，仓廪父母，干戈朕，琴朕，弔朕，二嫂使治朕栖。’象往入舜宫，舜在床琴。象曰：‘郁陶思君尔。’忸怩。舜曰：‘惟兹臣庶，汝其于予治。’不识舜不知象之将杀己与？”

曰：“奚而不知也？象忧亦忧，象喜亦喜。”

曰：“然则舜伪喜者与？”

曰：“否。昔者有馈生鱼于郑子产，子产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则洋洋焉；攸然而逝。’子产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谓子产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难罔以非其道。彼以爱兄之道来，故诚信而喜之，奚伪焉？”

（《孟子·万章上》）

象是舜同父异母的弟弟。《史记·五帝本纪》记载说：“舜父瞽叟盲，而舜母死，瞽叟更娶妻而生象，象傲。”舜的父母及象都曾经干过陷害舜的事情：打发舜去修谷仓，舜上了仓顶，他们却抽去梯子，放火烧谷仓；让舜去挖深井，舜下到井里，他们就用土填塞井口，不让舜出来。象还直言不讳地说，设法除掉舜都是我的功劳。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攫取牛羊仓库，占取干戈琴弓……象并不是没有道德本性，因为当他做了这些坏事见到舜的时候很是“忸怩”，可见他还是存有一丝羞愧之意。在孟子看来，人世间有恶人、恶心和恶行，但恶并没有独立的来源，本性、仁心存得住，就不会有恶，反之，就可能产生恶。

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除了强调“为仁由己”以外，孔子还进一步提出“仁者安仁”的观点。他认为，有“仁德”的人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安心于“仁”，不会作任何不道德的事，聪明人则能认识到“仁德”有利而行“仁”。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知者利仁。”（《论语·里仁》）

孔子根据不同的人对仁德的不同态度，把人分成三种类型：“不仁者”、“知者”和“仁者”。由于内心没有道德的准则，不仁的人既不能长久处于困窘之境，也不能长久处于安乐之境；认识到仁德对人对己有长远而巨大的益处，聪明的人利用仁；唯有真正行仁德的人，超出“利仁”的心理，达到“安仁”的境界，即不计较利害得失而行仁。

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

在许多人看来，“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实在是一种失败生活的象征。能真正欣赏颜回、真正肯定颜回价值的，大概只有孔子了。颜回是“安贫乐道”的典型，他的可贵不在于安于贫穷的生活，而在于不因为外在条件的恶劣而改变自己的乐趣。孔子并不是赞赏颜回的贫穷，而是赞叹他达到了“仁者安仁”的境界。

子曰：“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论语·先进》）

孔子对颜回贫困和子贡的富贵感叹不已。这段语录把一贫一富的颜回和子贡放在一起谈论，孔子究竟想说明什么？由于缺乏具体的语境，后人对此的理解分歧较大。仅从这段文字看，孔子并没有表现出赞扬贫困、反对富有的明显倾向。孔子倡导的是积极务实的精神，他并不一味

反对富贵，只是在富贵和仁道发生矛盾时，才把求富求贵放到次要的位置上：

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论语·述而》）

一个是“如不可求，从吾所好”，一个是“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孔子和颜回师生二人在精神境界上最为接近：

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
（《论语·述而》）

“惟我与尔有是夫”，能得到老师这样评价的只有颜回，因为只有颜回“其心三月不违仁，其馀则日月至焉而已矣。”（《论语·雍也》）

志士仁人杀身以成仁

达到“仁者安仁”境界的人，不仅仅具有“仁”的道德意识，而且还具有“仁”的道德情感。孔子认为，真能行仁，达到“仁”的境界就可以得到至高无上的快乐，没有恐惧，没有烦闷，在修养仁德、践履仁德的过程中得到感情的慰藉和快乐。这也是“仁者安仁”最可靠的心理基础。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论语·子罕》）

“知”、“仁”、“勇”是儒家所主张的道德范畴，孔子概括了具备这三种德行者的秉性：明智的人不疑惑，仁德的人不忧愁，勇敢的人不畏惧。

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论语·雍也》）

这段话的第一句句读不尽相同，也有人把它句读为“知者乐，水；仁者乐，山。”《说苑·杂言》对“知者乐水，仁者乐山”作了比较详细的解释。